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出版资助作品

WORKS FUNDED BY SOCIAL SCIENCE FUNDS
OF HUNAN PROVINCE

汉代《诗经》阐释的 诗学研究

毛宣国 著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出版资助作品

WORKS FUNDED BY SOCIAL SCIENCE FUNDS
OF HUNAN PROVINCE

汉代《诗经》阐释的 诗学研究

毛宣国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 / 毛宣国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561-0476-5

I. ①汉… II. ①毛… III. ①《诗经》—诗学—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1277号

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

著 者 毛宣国

责任编辑 郭 平

装帧设计 杨发凯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476-5

定 价 6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本书系：

2009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

内容提要

《诗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经典，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主要阐释对象和意义生成之源，而汉代是经学和经典解释传统形成和建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基础奠定重要阶段。汉代诗学理论基本上是围绕经学释义，更准确地说，是围绕《诗经》的阐释而建立起来的。理解汉代《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不仅是理解汉代诗学，也是理解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发展进程的一个关键。

本书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展开思考的。在“导论”部分，本书对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理路与方法予以说明，认为要正确评价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价值和意义，必须摒弃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对立的思维模式，重建汉代《诗经》阐释的历史语境，把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放到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充分重视这一语境在汉代诗学理论建构中的意义。同时，应从知识与意义双重关注的立场出发，以同情了解、开放多元的眼光看待《诗经》文本和诗学理论的研究。

本书分六章展开。第一章探究先秦《诗经》阐释与汉代诗学的关系。这一探究意在说明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观念方法的形成，并不只取决于汉代诗学自身，它受到先秦《诗经》阐释观念和方法的巨大影响，是先秦诗学理论合乎逻辑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具体说来，是春秋“赋诗断章”和政治礼义传统，影响到汉人道德化和政治化诗学观念的形成。而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对《诗经》的阐发，如孔子对《诗》的礼乐教化、政治教

化作用的重视，孟子的以仁义和王道仁政说《诗》和“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观念方法的提出，荀子的以《诗》证礼，明道宗经观点的提出，《孔子诗论》对“性情”和“礼义”关系的理解，更直接影响到汉代诗学，如通经致用、诗史结合、情礼结合，重《诗》的政治道德功用等观念和倾向的形成。

第二章结合汉代政治、思想、历史和文化的实际状况，探讨汉代《诗经》阐释的整体倾向，即经学化、历史化解《诗》的倾向与诗学的关系。从经学化倾向方面说，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汉代诗学因此也就是经学语境中的诗学。在汉代《诗经》阐释的经学语境中，潜含着“道”与“势”、“情”与“礼”、“文”与“用”等基本矛盾，反映了汉代诗学对文学的政治功用、道德功用的高度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将经学与文学、政治与审美根本对立起来。因为，《诗经》毕竟是诗歌文本，汉代学者对《诗经》的阐释，无论怎样经学化，怎样强调《诗》的道德政治功用，它都必须面对《诗》这一文本，面对《诗》所包含的审美质素与内涵。从历史化解《诗》方面说，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突出倾向，就是以《诗》为史，对《诗经》进行历史化的解读。这种倾向最突出表现在《毛诗》对《诗经》的阐释上。对这样一种阐释倾向，学术界多有批评，认为没有什么历史的根据，只是一种违反《诗》的本义的穿凿附会，而本书则认为，这种阐释倾向和方法的形成，为人们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于诗歌源流演变规律的认识，揭示了《诗经》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三章阐发今文经学《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主要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探讨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和《诗》学系统。《齐诗》反映出今文经学思想信仰和《诗经》阐释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深究天人之道，以阴阳五行说《诗》，以灾异说《诗》，以情性说《诗》，所以成为本书的阐释重点。第二部分是探讨今文经学《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主要讨

论三个问题：一、以“情性”说《诗》。主要以《齐诗》的“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说为例，具体分析了今文经学以“情性”说《诗》的理论意义，认为今文经学家以“情性”说《诗》虽带有神秘和政治功用色彩，甚至把《诗》看作为神学和政治教化的工具，但却也看到天与人的“感通应合”关系，突出了“情性”在《诗》的阐释中的作用，为《诗经》阐释注入了新的合理成分。二、以“灾异”说《诗》。以“灾异”说《诗》的特点是牵引诗义以合天道，把《诗》看成是对统治者无德政治的警示和谴告，这固然有湮没《诗》的文学和艺术价值的危险，但毕竟意味着《诗》的地位的提高，扩充了《诗》的使命与功能。另外，以“灾异”说《诗》，还包含着“以类相召”、“假经设谊、依托象类”的诠释策略和方式，与中国古代的重“象”、重直觉类比的思维方式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对于理解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一定意义。三、“《诗》无达诂”说。“《诗》无达诂”是今文经学家提出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学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今人多站在现代文学、诗学立场上，把它看成是一个与文学和诗学审美接受相关的命题。实际上，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形成，与今文经学家《诗经》解读的经学立场密切相关，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义，不仅只从文学和审美接受的立场上理解，更应该从以经典阐释核心的诗学解释学意义上理解。第三部分探讨纬书的《诗经》阐释与诗学理论。纬书对《诗经》的解释受到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的很大影响，所以亦放在今文诗学中讨论。纬书对《诗》的理解，贯穿着天人合德的星象政治思维，对《诗》意的曲解十分明显，但由于注意到“天道幽微”的《诗》意展现对于人伦社会的警示作用，为《诗》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容。神话叙事也是纬书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亦包含着某种历史文献价值。纬书所提出的重要诗学观点，如“诗者，天地之心”，“诗含五际六情”，“诗者，持也”，“圣人作乐，不可以自娱”等，对于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亦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四章探讨《毛诗》《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毛诗》的《诗经》

阐释与今文经学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更自觉地秉承了先秦孔门诗教精神，也更接近《诗经》文本和历史的真实。本章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探讨了《毛诗》《诗经》阐释的特色、体式与方法。这一探讨意在说明《毛诗》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最权威的《诗经》解释系统，它所形成的方法和体例有很大合理性。《毛诗》的解《诗》较前人来说，更多表现了对原典和文本的尊重，保留了较多的原始的解《诗》信息，在方法上更加严谨周备，所以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道德说教、服务于经学、政治和主观附会的释义系统而予以轻易的否定。第二部分则讨论《毛诗》《诗经》阐释中的诗学理论问题。首先是“教化”问题。“教化”是《毛诗》《诗经》阐释中的核心问题。《毛诗》是从男女夫妇之道出发言教化，是将风俗美善的追求与儒家的政治教化、礼乐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并把统治者也纳入教化的范围，所以《毛诗》所言“教化”，不仅构成一个教化体系，而且表现出广泛的人伦教化精神。其次是“情性”问题。“诗教”因情而生，不脱离情性，这是《诗经》诞生之日起，孔门诗教传统形成以来就固有的主题，《毛诗》也不例外。《毛诗》以“情性”论《诗》，《诗大序》是一个关键，它对《诗》的情感本质和功用的纲领性阐发，说明汉代较之先秦在诗的情感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而《诗小序》、《毛传》、《郑笺》对《诗经》的情感性解读，深化了人们对《诗》的情感内容和艺术特征的理解。再次是“比兴”问题。《毛诗》对“比兴”的阐释，蕴含着双重意味：一是将“兴”与“比”等同起来，重“比兴”的美刺讽喻和道德教化功能；二是把“兴”与“比”分立开来，重视“兴”的生命感发意味。这样的“比兴”观，实际上包含着中国古代诗学中政治与审美的矛盾张力与内在悖反。《毛诗》对“比兴”的阐释，构成中国“比兴”诗学理论的关键一环。复次讨论“感应”和以“时”论《诗》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讨论，说明《毛诗》的《诗经》阐释不仅服务于政治、道德，而且有一种对生命的体认和对时代的忧患与关怀。最后则是讨论以礼说《诗》和“笺注体”方法的意义，它突出体现在《郑笺》对《诗经》的解释活动中。

《郑笺》以礼说《诗》，不仅仅是为了阐发《诗经》的本义，更重要的是为了修复儒家的礼仪政治传统，重建人们对儒家文化的信任。“笺注体”的方法关注的是文本结构本身，关注的是语词字句、篇章结构的阐释，关注的是语境在语言文字阐释中的意义，拓展了《诗》意阅读和诗学理解的空间。

第五章探讨史家辞赋家的《诗经》阐释与诗学观。它集中体现在司马迁的“发愤作《诗》”、班固的“咸非其本义”和以“风俗观《诗》”、扬雄的“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等命题的提出上。本章首先讨论了司马迁的“发愤作《诗》”说，认为它既与先秦至汉《诗经》批评传统相关，又有着新的突破和发展，那就是它明确将《诗》的情感表现定位于“怨愤”上，更加突出文学反映人生的价值，更多关注到个体情感的表达。其次是讨论班固的“咸非其本义”和以“风俗”观《诗》说，认为前者的意义在于它在《诗经》阐释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的本义问题，从而推动了人们对《诗》的文学和审美特征的认识。而后者的意义则是将《诗》的政治教化与风俗民俗审美有机结合起来，开辟了从风俗、民俗角度阐释《诗》的新视角。再次是讨论扬雄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说。认为此说虽然还是在经学语境基础上做出的，却充分注意到处于经学传统外的文人身份和写作方式的存在，对中国古代诗歌作者身份和文人身份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是讨论《诗经》阐释与汉赋、楚辞批评的关系，认为汉赋与楚辞的诗学术语和批评规范的建立与《诗经》阐释密切相关，依《诗》论赋，依《诗》论骚是汉赋与楚辞批评的基本特点，这也有力地说明《诗经》阐释在汉代诗学批评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对后世批评的巨大影响。

第六章探讨汉代《诗经》阐释对后世诗学的影响。本章认为，汉代《诗经》阐释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引发了哪些具体的《诗》学命题和观点，而在于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奠定，对中国古代诗学思维模式的影响。要认识汉代《诗经》阐释的意义和影响，必须超越将《诗经》阐释定

位在以审美为本位，强调做纯文学研究的观念和立场，必须超越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诗学史上，占主导地位文学观念并非是那种以审美为本位的文学观念，而是文兼众体，弥纶群言，与中国古代经学、政治、道德有着紧密联系的文学观念。所以，产生于经学背景下，将“经”与“文”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汉代《诗经》阐释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诗学理论的发展生成来说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意义主要并不在于它是从文学自觉和审美的角度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诗学命题和观点，而是在于它适应了中国文化和思维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中国诗学思想发展的最深层动力出发，对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文学诗学问题予以合理解释与说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集中体现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比兴”阐释方式、“教化”诗学传统、“感应”诗学观念、“讽寓”诗学模式等方面。

本书的思考有一个中心，那就是认为，中国诗学传统，特别是在中国诗学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儒家诗学传统的形成，依赖于经典的解释，有着经学的巨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诗学因此就偏离了文学的轨道。中国诗学从汉代起就形成高度重视政治、道德教化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根本排斥和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中国诗学，特别是儒家诗学可以说是在汉代《诗经》阐释所奠定的诗学语境中形成的，是在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所以，在“结语”中提出如何在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关系中理解中国古代诗学的问题，并把它看成是正确评价和理解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价值的关键。

目 录

导 论 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001

一、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研究现状回顾 / 001

二、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研究的意义 / 008

三、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研究的理路与方法 / 012

四、本书中“诗学”概念的内涵 / 024

第一章 先秦《诗经》阐释与汉代诗学 / 031

第一节 春秋赋诗引诗与汉代诗学问题的发生 / 031

第二节 孔子、孟子、荀子的《诗经》阐释与汉代诗学 / 043

第三节 《孔子诗论》与汉代诗学 / 054

第二章 汉代《诗经》阐释的经史化倾向与诗学问题 / 059

第一节 汉代《诗经》阐释的经学倾向与诗学定位 / 059

一、汉代经学地位的形成和《诗》被经学化的原因 / 060

二、经学语境下汉代《诗经》阐释的内在矛盾 / 068

第二节 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 / 075

第三章 今文经学《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 / 094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和《诗》学系统 / 094

一、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与诗学观的确立 / 094

二、今文《诗》学传承系统与阐释重点 / 099

第二节 今文经学《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 / 105

一、以“情性”说《诗》 / 105

二、以“灾异”说《诗》 / 125

三、“《诗》无达诂”说 / 142

第三节 纬书的《诗经》阐释与诗学理论 / 159

一、纬书与经学的关系及其意义指向 / 161

二、纬书对《诗经》篇章的阐释 / 166

三、纬书的诗学理论 / 178

第四章 《毛诗》《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 / 189

第一节 《毛诗》《诗经》阐释的特色、体式与方法 / 189

一、《毛诗》《诗经》阐释的基本特色 / 189

二、《毛诗》《诗经》阐释的体式与方法 / 194

第二节 《毛诗》《诗经》阐释中的诗学理论问题 / 202

一、“教化”问题 / 202

- 二、“情性”问题 / 219
- 三、“比兴”问题 / 237
- 四、“感应”和以“时”论《诗》 / 254
- 五、以礼说《诗》和“笺注体”方法的意义 / 268

第五章 史家辞赋家的《诗经》阐释与诗学观 / 280

- 第一节 司马迁的“发愤作《诗》”说 / 281
- 第二节 班固的“咸非其本义”和以“风俗”观《诗》说 / 291
 - 一、“咸非其本义”说 / 292
 - 二、以“风俗”观《诗》说 / 299
- 第三节 扬雄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说 / 304
- 第四节 《诗经》阐释与汉赋、楚辞批评 / 317
 - 一、《诗经》阐释与汉赋批评 / 318
 - 二、《诗经》阐释与楚辞批评 / 327

第六章 汉代《诗经》阐释对后世诗学的影响 / 336

- 第一节 汉代《诗经》阐释中一些代表性观点的辨析 / 337
- 第二节 汉代《诗经》阐释与“依经立义”话语方式 / 347
- 第三节 汉代《诗经》阐释与“比兴”阐释方式 / 352
- 第四节 汉代《诗经》阐释与“教化”诗学传统 / 358
- 第五节 汉代《诗经》阐释与“感应”诗学观念 / 373
- 第六节 汉代《诗经》阐释与“讽寓”诗学模式 / 379

结 语 在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的关系中理解中国古代诗学 / 386

一、在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中理解中国古代诗学 / 386

二、在教化与审美的关系中理解中国古代诗学 / 393

参考文献 / 400

导 论

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本书是关于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设定这样的论题，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关于汉代《诗经》阐释特征和方式的研究，这种研究实际上也成为理解汉代诗学问题的重要前提和依据，一是对汉代《诗经》阐释中重要诗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目的，则在于揭示汉代诗学理论的独特性及其对后世诗学理论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揭示同样离不开汉代《诗经》阐释所构成的诗学背景和解释学传统。这样的论题设定，涉及的理论问题较多，知识背景复杂，所以，在进入本论题的具体探讨之前，有必要对本论题的意义、研究理路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作一番解释和说明。

一、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研究现状回顾

《诗经》历来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重镇，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有关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的研究

成果不断。^①学术界有关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论的研究,已凸显出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研究的一些特色。特别是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以《诗》为经,以《诗》为史,以《诗》为教的特色,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一统精神的体现的诗学功能和作用,等等,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有关汉代诗(《诗》)学的代表性学派,如《毛诗》、三家诗的研究,以及汉代著名学者,如司马迁、班固、刘向、郑玄等人的诗学著述和观点,也得到充分的重视。研究者还普遍注意到汉代诗学和《诗经》学与先秦诗学和《诗经》学的关系,一些新出土的文

① 20世纪以来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的研究大致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首先是从经学史的角度对汉代《诗经》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蒙文通的《经学抉原》,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钱穆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王葆玟的《今古文经学新论》等;其次是从《诗经》学史的角度涉及汉代《诗经》阐释中的一些诗学问题,如廖平的《诗学质疑》、《诗纬新解》,章太炎的《六诗说》,刘师培的《毛诗札记》,顾颉刚的《〈诗经〉全为乐歌说》,郑振铎的《读毛诗序》,吴闿生的《诗义会通》,闻一多的《歌与诗》、《风诗类抄》,朱自清的《诗言志辩》,胡朴安的《诗经学》,朱东润的《诗三百篇探故》,钱穆的《读〈诗经〉》,张西堂的《诗经六论》,何定生的《诗经今论》,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赵霭霖的《诗经研究反思》,冯浩菲的《历代诗经论说述评》,洪湛侯的《诗经学史》,黄振民的《诗经研究》,林叶连的《中国历代诗经学》等;再次是从《诗经》文本解读角度阐发汉代《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如黄焯的《毛诗郑笺平议》,高亨的《诗经今注》,陈子展的《诗经直解》等;复次是以理论专著的形式系统探讨汉代经学文论与《诗》学问题。这一类著作近年不断涌现,如郁积意的《经典的批判》,程勇的《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谭德兴的《汉代诗学》,侯文学的《汉代经学与文学》,吴万钟的《从〈诗〉到经》,陈桐生的《〈史记〉与〈诗经〉》,汪祚民的《〈诗经〉文学阐释史》,刘立志的《汉代诗经学史论》,于淑娟的《韩诗外传研究》,梁锡锋的《郑玄以礼笺诗研究》等。除以上的研究外,汉代《诗经》文献与著述的考录也取得重要进展,代表性的著作如刘毓庆的《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著录汉代《诗经》学著作多达六十余种,极大地弥补了汉代《诗经》文献研究的不足。还应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尚未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如常森的《〈诗〉的崇高与汨没:两汉〈诗经〉学研究》,王承略的《两汉〈诗经〉学史专题研究》,赵茂林的《〈两汉三家诗〉研究》等,对汉代《诗经》阐释观念作了系统的解读,并涉及一些重要的诗学问题。一些中国诗学理论史和批评史的专著专论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专题研究:〈诗经〉与中国古代诗说简论》,王运熙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胡晓明的《中国诗学精神》,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李春青的《诗与意识形态》,等等。另外,还有来自海外和港台的研究成果,如徐复观的《汉代思想史》,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龚鹏程的《汉代思潮》,刘光义的《汉武帝之用儒及汉儒之说诗》,它们虽然不是《诗经》学和诗学而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著作,却对我们深入认识汉代《诗经》阐释中的诗学思想多有启发。

献，如《孔子诗论》、阜阳汉简《诗经》乃至镜铭、碑刻等一些与汉代诗学相关的材料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但是，现有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失，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一，对汉代诗学评价的偏失。现有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看法，那就是认为汉人功利性太强，将文学价值依附于道德政治功能下，因而扭曲文学，根本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和独立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与汉代诗学理论和批评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对汉代《诗经》学研究评价的偏失。学术界普遍认为，汉人以道德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其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的文本就是《诗经》。汉人的《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是经学而非文学的，是以经学为本而遮蔽了《诗经》的文学性，根本忽视《诗经》的文学和审美价值，从而把《诗经》变成王道政治和道德说教的工具。

这种评价的偏失，早在 20 世纪初就突出表现出来，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郑振铎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就以非常严厉的态度批判了汉代的诗学理论和《诗经》学研究，在他们的眼中，汉代学者是一群腐儒，完全曲解了《诗经》的本义，把《诗经》变成道德说教的工具，从而也使汉代诗学从根本上丧失了对文学的审美认识和把握的功能。在“古史辨派”学者看来，正确的《诗经》研究是回归文学的本位，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本来，从明代开始，《诗经》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一种倾向，区别“经学”与“文学”解读方式的不同，如万时华“《诗》之为经”与“《诗》之为诗”（《〈诗经〉偶笺》）的区分，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诗绎》）和诗“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姜斋诗话》）之说，陈继揆的“以经读《诗》，不若以‘诗’读《诗》之感人尤捷”（《读风臆补》）之说，等等，都是试图区分文学与经学解《诗》的不同。但是，在明清人的眼中，以诗解《诗》和对《诗经》作文学的解读，并不能成为《诗经》解读的唯一方式，这种解读与《诗经》其他解读（如经学的解读）并不构成根本